

# 从《雪夜访戴》到《突然的散步》

□张乐朋

《突然的散步》是卡夫卡的一个短篇，收在《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里，更像个随笔。卡夫卡的作品当然是卡夫卡的叙事，你不明白他为何起笔为何收笔，更不明白他为何那么写。他写一个人深夜突然兴起换上衣服出门，他获得一些待在房间没有的肢体放松和自由，并产生出造访朋友的念头，“看看他过得怎样”。

无独有偶，用这个词是因为正好有一个特别有魏晋风度的《雪夜访戴》，这故事列在《世说新语》的“任诞四十七”，讲王子猷于雪夜兴起造访戴安道，这个故事被现在的人们来说去写来去，好像挂在嘴角就会沾染一些魏晋风度似的。

卡夫卡在世界文学史上已经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目前在阅读邱华栋博士时，正好看到他提出的一个“大陆漂移”观点，印证了前面的说法，邱华栋发现：“纵观世界文学，20世纪小说波澜壮阔的总体发展态势和图景，犹如地理学上的大陆漂移”，“卡夫卡在有自己的先驱的同时，也影响了后辈的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言”。20多年前也读过卡夫卡，读《变形记》和《中国长城修建时》的那种不舒服记忆尤深，因为我一直没有把握，我承认在阅读卡夫卡的小说时感到吃力，这样的作家极少有。我一度怀疑那些言必称卡夫卡的作家是不是在故弄玄虚，关于这些想法随后我将慢慢写一个盘桓久去伪存真的认识过程。去年到鲁院学习，至少有两位授课老师强调必读卡夫卡，其一还要求除了读小说，最好读他的散文随笔日记，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很在乎后面这个老师的说法，买了相关的书籍，准备补上卡夫卡这一课。一切都是机缘凑巧，今年5月初过访张锐锋，他馈赠我三本新书，其一正好叫做《卡夫卡谜题》，这是一本类似读书笔记的随笔，见解独到，于我而言正是书到用时，是近似于工具书的著作，后来我开始读卡夫卡的小说作品选和散文时，就参考一下张锐锋的解读，这样比对倒不是一味求同，但在遇到阅读迷惑和困顿时，确实能起到拨云见日和“通关”的作用。

《雪夜访戴》就无须更多的提示，包括刺激王子猷兴起的

《招隐诗》，甚至左思其他的作品如具有移风易俗作用的8首《咏史》诗，他隐忍不快，怀才不遇的愤懑让人心领神悟，于是乎，王子猷内心起了什么波澜，生发什么感慨，为何决计冒雪造访，左思的风力掀动他对左思和戴安道的惺惺相惜之情，这些情况下即使一字不著，我们还是能把握住脉搏的。所以时隔一千年再看其人行事犹然丝毫没有违和之感。前些年在任编辑，不时就能读到鉴赏本文的来稿，足见《雪夜访戴》那种疏旷飘逸的影响之弥漫和久远。

这样就提出一个不新但常新的问题，文化背景形成的阅读障碍使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感到晦涩和艰深，这种障碍又生成心理暗示，比如《突然的散步》的角色是抑郁自闭的、病态的，其不为人知有他自身拒斥他人的缘故，他的心底全世界让你“小扣柴扉久不开”，让你几遍读罢依旧生分隔膜和费解。

《雪夜访戴》对于成熟的读者会觉得艰涩，即使是用文言叙事，也恰恰成就了读书人喜好的风雅。王子猷兴起而往兴尽而返，重过程不重结果的做派，大致我们若得其便也乐意效仿一把雅皮一下。这种理解的轻易程度，也是精神气息的内在相通和贴切形成的。我们甚至能异口同声说出，高人高行，所以人不知而不愠。

这样的话就看到一个人们不大在意也不会引起阅读经验的参考系统，欧洲作家卡夫卡之于我们的空间距离，东晋人物王子猷之于我们的时间距离，从接受的角度来说，克服时间跨度要比空间距离容易得多，换言之，理解和领会经典传承比之于翻译作品要便捷一些。

第三个是要看到卡夫卡及其个性化的东西，我不明白这种性格里的幽僻怎么会以文学艺术的基本形式准确流传给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和亚洲的莫言，摘抄一段话来佐证我的怀疑：“我不相信世上有什么人的内心状况与我相似，可是我能想象这样的人存在；但说有一只神秘的乌鸦不停地围绕着他们的脑袋飞旋，就像它围绕着我的脑袋飞旋一样，那我连想象

也办不到了。”这段话是卡夫卡1921年10月17日的日记内容。他的话一以贯之地前后抵牾，似乎他要清楚地拒绝别人的理解。1918年2月4日的日记写得更绝：“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很有意思，莫言曾在一个谈话里兴致勃勃地说他写作时的感觉就像皇帝主宰一切，生杀予夺。原话大意如此，但出处待查，那么莫言的强势应该更多地像巴尔扎克才对。

卡夫卡的精神实质，还是由卡夫卡自己来说。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从文学方面看，我的命运非常简单。描写我梦一般的内心生活的意义，使其他一切变得次要，使我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制不住。没有别的任何东西能使我满足。”这算不算断章取义？读读《煤桶骑士》和《乡村医生》，他动笔时的现实，后来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和不可思议的结果，复述都有困难。这些东西不是我想要在此费猜和探讨的。

从《雪夜访戴》到《突然的散步》，不妨来做一番诗情画意的比较，看《雪夜访戴》就是在看一幅中国画，纸是宣纸，形是水墨，“四望皎然”，已是写意之笔了；还有画面传出的气味，平和熟稔，依然是翰墨生香。《突然的散步》就是油画，画布是亚麻，形迹是油膏，画面的气味是浓烈的刺鼻的，如果观赏者感到呼吸不适因此抑郁，进而影响对作品的理解和领悟也未可知。

张锐锋认为卡夫卡作品的难解之处，在于“它实际上被表现为一个个谜题，让我们在迷雾中穿行，小心地看着前面令人迷惑的一条条岔路。其中一条，通往我们自己”。没想到，我们握着渴望理解的钥匙，最后打开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扉，简直是出乎意料之外，也是着实没有想到的。于是我想说，如果挣脱固定思维的文化再看，《雪夜访戴》和《突然的散步》这两个作品里的人物——他们突然兴起，深夜出门的折腾，寻寻觅觅的全程，正是“求其放心而已”。



张建国 摄

## 《天黑请闭眼》：隐喻的织体

□高方方

作为鲁军新锐作家的宗利华，虽然致力于欲望化极强的婚恋题材小说的书写，却能够固守文学的精神位格，既不迷恋先锋文学的魔幻化形式拼贴，也没有通过对出位的身体欲望化的情色描写来哗众取宠。他的小说逶迤徐来，无边延伸，褪去了情节和形式的沉重外壳，承载了小说家之于时代生活浓郁的感受力，就像是一线侧阳的阳光，穿透了潮湿迷离的烟霭，引导读者去探究人性细部的缠绕，而那些繁芜杂乱的情绪也熔铸液化成为文本底座上无边深幽的一抹青蓝。

可以说，所有的叙事性文本都是一个隐喻的织体，形态各异的人物，因着生活中的种种必然和偶然，网罗着一段段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故事的经纶之上却依持着各色的碎屑，在这纷繁碎屑的背后又映衬暗喻出不同的精神丝缕。盘附在宗利华小说《天黑请闭眼》上的精神丝缕便是一种道德的焦虑感，婚姻、爱情和性的相互纠结，让这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情感角力时时刻刻都饱受着责任、良知和道德上的拷问。

作者在创作谈《有条线在那儿》中这样说到，“似乎有条线在那儿。这边与那边，截然不同。一边轻松自如，一边却沉重压抑。就好比足球场上那条越位线，越过去，边裁的旗子就毫不客气举起来。又好比游戏，玩过了头，游戏对你来说极有可能是某种现实存在。”男主人公丁一进行了两次危险的越位，如果说第一次和陶小陶的越位游戏仅是赤裸裸的肉欲，还谈不上是对婚姻彻底性背叛的话，那么他和唐卡的二度越位，则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出离，可悲的是，当唐卡的身体作为性资本被征用之后，却让双方的精神交流出现了阻滞，“丁一的情绪并没有因为拥有了唐卡而变得更好”，而唐卡“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天黑了，请闭眼”，睁开眼之后，角色变了，整个人物的关系都变了，悲剧色彩突然加重，蓝色变成了红黑色，成了猪肝”。先前在两人小心翼翼维持下的所谓第四类情感也从众似的成了不洁的“杂质”，欲望化时代的柏拉图之恋终结在“天黑请闭眼”的一瞬，试图在肉体沙地上建筑精神交流的大厦的热望，也在良知和道德的双重裹挟下轰然倒塌。

这是一部具有隐喻性的小说，“唐卡”的隐喻义是在文章的第七部分显现的，和安安见面后，陶小陶暗示安安对其婚姻真正造成威胁的是“西藏”一门宗教意味浓郁的绘画艺术（即唐卡），进而用“国唐”、“止唐”和“堆绣”来隐晦地说明她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国唐是用丝绢制作的唐卡，需要经过繁复的制作工序，富丽堂皇，是真正的唐卡贵族，如果放在封建帝王时代，就好比皇后；而止唐则是在普通画布上用颜料绘制的唐卡，充其量不过是妃子；堆绣则是以缎纹为底，数色丝线穿插的点缀。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加以阐释，安安虽然算得上是“国唐”，是法律意义上的丁太太，但想来不过是一“女”囚于“家”中，最大的悲哀在于失去自我，失去整个世界，在家庭这座体面的监狱中虚耗宝贵的生命，甚至其肉体的痛感——胃疼、头疼，也取决于丁一的情感走势，她就像是张爱玲笔下“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子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所幸的是，安安最终救赎了自己，她又找回了“手指对手术刀那种熟稔的依赖感”。

如果说安安的内伤因外伤的存在而能够获得心灵痛感，哪怕片刻的缓释，那么浸淫在唐卡灵魂深处、直抵骨髓的内伤，则是难以排解的，两难之下，唐卡最终选择让安安给自己隆胸，用外伤手段来治疗内痛，这种救赎自己也救赎别人的行为，虽然偏激得令人震惊，但与己而言，可谓是一种情感压力的释放，并且，这救赎因着血的疼痛而被赋予了宗教仪礼般的神圣，这也表明唐卡主动选择了“止唐”，要彻底终止这段与丁一的游戏。

对于“堆绣”陶小陶这样一位年轻开放的“80后”，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是整个小说文本的张力所在，她的出现打乱了三人间相对平衡的暧昧关系，穿越大峡谷，因陶小陶的存在，丁一得以有机会向唐卡敞开自己内心的“隐秘区域”，让唐卡意识到自己对丁一的感觉，当陶小陶成为丁一的情人后，唐卡以姐妹的身份替安安劝陶小陶离开时，突然觉得“心脏某个部位被狠狠地打了一拳”，并激起了内心无限的疼痛与羞耻，这又为唐卡后来的身体越位埋下了伏笔。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女一男，惟有陶小陶没有在这段情爱中迷失自我，这也是作者选择用“陶”小“陶”，这样一个名字的原因，“陶”还是“陶”，“我”还是“我”，没有疲惫也没有忧伤，不主动去付出真情也不奢望获得真情，所以也就无关乎什么道德和良知的谴责，这样说来，陶小陶倒是一个会明哲保身的智者，她明白自己“堆绣”的地位，自己永远都是丁一生活皱纹上缭绕于表层的丝线，是悬空的，没有着落的，但我们不禁发问：这样无止尽的不问来路也不明去处的“逃”避与“逃”，到底何时才是终结？

我们再将目光投射到这篇小说惟一的男主人公身上，丁一是极具诱惑力的钻石男，有稳重的个性、成功的事业、俊朗的外表，几乎对每一个女人都有着致命的杀伤力，但丁一又绝不是那种逢场作戏热衷风月的纨绔之人，他骨子里还残留着“70后”传统的伦理道德感，所以当妻子安安生病住院后，他“双手捂着脸，俯着身子，像个低头认罪的犯人”，表现出无尽的悔意和自责，虽然他對唐卡说，“我们没有错”，但听来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值得玩味的是，丁一无意间在医院门口对唐卡说出的，他重返大峡谷，重回小山沟的那段心理感悟，实际上隐晦地说出了丁一的情感选择——放弃唐卡，找回安安，因为安安才是地面上的那个“点”，家才是他的“根”。小说结尾处，丁一蹲坐在医院对面马路边上，当年和安安初识场景的回忆，也再一次确认了丁一对于自我情感的回归，再往深处说一点，手术台上唐卡献祭般接受了安安末日审判的同时，“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天黑了，请闭眼”，而丁一已经在精神上将作为情人的唐卡“杀死”了。呵，又一场“天黑请闭眼”上演了，丁一还是“杀手”，唐卡还是“死者”，安安成为了“法官”。

记得张洁在其小说《无字》中有这么几行诗：“我不过是个人/来到圣殿/献上圣香，然后转身离去/而不是从来的路返回原处/而是继续前行/并且原谅了自己”。其实，朝圣之路即是寻爱之路，敬献圣香之后，朝圣者丁一就返回原处，尽管他永远不能走来时的那条小路，但仰望一下天空，他选择继续前行，很容易地原谅了自己的“一场错误”，他依然有自己的归处。然而，被朝圣的“唐卡”，却要永远地在经幡和转经筒的声响中暗哑黯淡了。

对湖北青年作家郭海燕来说，中篇小说《春嫂的谜语》是她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终于从那些类似于“青春回望”的自我书写中撤离出来，而将视线投向身边的芸芸大众。在这篇小说中，郭海燕将一个丧偶后进城的农村女性推到我们面前，书写了女主角在城市里的遭遇以及生活中的种种变故，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作者对内地女性命运的关注。

小说开篇写道：“春嫂捏着那纸片，到处是眼晕的高楼，车流不断的大马路，蝌蚪样的人群，春嫂发蒙，半天挪不开步。”由于空间的转移带来陌生感，大多数农民工对城市的认识都是从审视城市空间开始的，这个空间起始带给她们新奇和迷惑，也带给她们茫然和恐惧。春嫂也不能例外，她的“发蒙”让我们为她的进城之旅捏了一把汗，有了一种隐隐的担忧。春嫂进城要做保姆的，而保姆可能是农民进城所选择的众多职业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她们所要依托的是一个家庭，但这个家庭随时可能拒她于千里之外。由于保姆是服务性质的工作，以及进入新空间之后所必然遭到的怀疑和试探，都使保姆成为打工族群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弱势群体。

小说开篇的“发蒙”成为一个重要的隐喻，它暗示了春嫂之城之初的境遇。刚进城时碰到指路收费的王进宝让她“发蒙”，东家铁门旁“牵个翘电线的金属筒”让她“发蒙”，庄童的谜语让她“发蒙”，城里老太太的吝啬让她“发蒙”，东家的不信任让她“发蒙”……春嫂在农村所形成的价值观、世界观在城市经受了最严重的挑战，我们几乎要认为春嫂的进城之旅是苦难之旅，作者所表现的是城乡之间的严重二元对立了。但是，随着小说的步步推进，我们发现情形并非如此，春嫂并不像她刚进城时那样容易“发蒙”，她很快就将自己的角色调整过来，并学会了如何在城里生活、如何与城里人相处。作为保姆，她能巧妙地调节男东家与女东家之间的关系，在两人的夹缝中游刃有余地生存；在正常的家务劳动之外，春嫂近乎就是东家的精神导师了——庄吉文需要和春嫂谈心以缓解工作压力；缺乏母爱的庄童也非常依赖春嫂；庄吉文的妈妈更是需要春嫂解闷；等到庄吉文再婚后，春嫂又巧妙地缓解他们紧张的夫妻关系，成为庄吉文夫妇传话的中介。以此看来，《春嫂的谜语》讲述的似乎是“春嫂的传奇”——她以保姆的身份，却能够在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现代家庭里一度成为“主心骨”。小说中的城市和乡村是一个互补的和谐的存在，城市的外表是热闹繁华，内里却敏感脆弱，需要乡村坚强、简单、淳朴等美好品质的照耀。这可能就是庄家离不开春嫂的深层原因之一。

不过，作者并没有沉溺于书写春嫂在城市的种种遭际，而将笔墨宕开去，延伸到春嫂的乡村生活，“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通过城市和乡村的双重书写共同塑造了春嫂这个人物形象，在春嫂身上，集中了湖北女性的坚韧、睿智、泼辣和善良等文化性格。比如，丈夫去世，春嫂没有一味沉浸在痛苦之中，而是勇敢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生活中的各种困难都没有将她打垮，无论是女儿秋月的未婚先孕，儿子秋阳的腿伤，还是女儿秋水的离家出走……生活中所有的烦恼甚或灾难都被春嫂一一化解。同时，春嫂也有她泼辣的一面，当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找“准女婿”宿景辉时，她及时拨通村长的电话，并当众与人讲理，有效地平息了这场冲突。指路收费的王进宝爱上了她并大胆向她表白，可是春嫂把王进宝“当客一样看待”，既给足了对方面子又含蓄表达了自己的拒绝，这是她的睿智。于春嫂而言，进可以到城，退可以回村，在城乡之间往来自如。

以此看来，郭海燕创造的春嫂是方方、池莉等湖北女作家所塑造的底层“女强人”形象的一种延续，这些女性形象的共同特点是坚韧、泼辣、睿智，比如方方笔下的英芝、李宝莉们，池莉笔下的辣妹、来双扬们。从这个层面看来，春嫂与她们是精神姐妹，有着血脉相连的意思。但是，郭海燕还是将春嫂与英芝、李宝莉、辣妹、来双扬们区别开来。相较于英芝的惨烈、李宝莉的隐忍、辣妹的粗俗与来双扬的精明，春嫂有一种来自于底层民间最原始的善良、质朴与率真。春嫂真正打动东家、打动王进宝的，应该就是这种善良、质朴与率真。

实际上，如果单是从个人境遇上来看，春嫂的确是有诸多底层苦难因子的，比如她早年就随丈夫进城打工，后来中年丧夫，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进城当保姆。乡下的留守儿童们一个个出问题：大女儿未婚先孕、二女儿辍学当洗头妹，春嫂一次次回乡面对，置身艰窘；当儿子被人铲断腿胫骨住院时，她四处筹措昂贵的医药费；好不容易孩子的事情都妥善解决了，自己却罹患癌症。从这些情节来看，这篇小说完全是一部农村女性的苦难史、血泪史。然而，通读全文，我们发现，作者淡化了苦难，而着重表现春嫂坚韧、顽强的一面，表现人性美好的一面。与此相关，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温暖的氛围、阳光的气息和一种隐隐向上的力量。小说中春嫂的谜语是“青石板，板青石，青石板上钉洋钉”，生活中的困难原本就是像青石板一样坚硬而冷峻的，只有那些拥有“青石板上钉洋钉”般坚韧与顽强的人们才能够最终拥有象征着美好理想和愿望的“满天星”。

然而，春嫂同样是懵懂的，她对女性角色的体认也是那个封闭的乡村传授给她的。虽然她意识到女性的不平等地位，然而在她的潜意识里，在两性关系中对女性角色的定位还是依附性的。比如她认为女人应该温柔体贴，相夫教子，像“唐卉还不到三十岁，硕士，大律师啊，就是个性太强、嗓子沙”，在她眼中女性个性强并不是什么好事，而“嗓子沙”则暗示着唐卉关于甜美、圆润这些文化传统所指称的女性美好性别特征的丧失。在春嫂看来，这正是唐卉婚姻生活不幸的原因之一。由此观之，作者写出了一大批出没于街头巷尾或者田间地头的春嫂们，她们有着湖北女性所具有的泼辣、睿智、坚韧等美好品质，然而也有着内地闭塞的文化所熏染出的保守与局限。因此，在春嫂身上，既蕴含着作者的褒美，也隐藏着作者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春嫂这个形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让人稍感遗憾的是，作者似乎对春嫂太宠爱了些，春嫂因此有了一点被“神化”的嫌疑。不过，瑕不掩瑜，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来说，《春嫂的谜语》都是郭海燕创作的重要转折点，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小说。

《春嫂的谜语》·关注普通女性的命运  
□马英